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古代文学

——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潘树广 黄镇伟 包礼祥 著

研究导论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的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进行过无数的论争。这种探索和论争,是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之研究”,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我们无意于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系统的阐释和全面的理论构建,只想围绕自己教学和研究中的实际感受,从若干侧面作些事实梳理与理论思考。

全书分16章。起首两章是引论部分,主要论述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传统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方法的层次等问题;第3至6章,是对近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第7至14章,评介传统的和现代的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第15至16章,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思考与展望。

回顾本书的写作,从酝酿到成书,已近十年了。1988年,我开始给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古典文学研究导论”课,这是和我的另一门课“文学文献学基础”相辅而行的。“文献学基础”主要解决如何占有资料的问题,“研究导论”主要探讨如何驾驭资料撰写论文。当时的“研究导论”课,主要是概述近百年来古典文学的研究历程,讲授研究工作的一般程序、方法和基本要求,试图为学生撰写论文提供些帮助。1992年秋,国家教委公

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课题指南,其中有“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项。我感到该课题与我的“导论”课有相通之处,便申报该课题,有幸获准。但“导论”课的内容与该课题毕竟有较大的距离,以我个人之力亦难以完成这一课题。于是我们组成课题组,拟定大纲,切磋琢磨,分工执笔。本书不采用“主编制”而是用并列署名的方式,旨在尊重各人的见解,不刻意追求观点的趋同。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假如本书的出版,能给初涉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年青同志一些启示,能为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一点建筑材料,已经是喜出望外的事了。

本书由三人执笔,分工如下:

潘树广 第一至第八章;

黄镇伟 第十二至十五章;

包礼祥 第九、十、十一、十六章。

涂小马校改了第九、十两章。又,1993至1994年,研究生童斌、王建先后写出学年论文《1988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方法问题讨论述评》和《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本书采用了其中部分观点和材料。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应启后、孙景尧两位教授的热情帮助。他们分别审阅了第十六章第一节和第十一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安徽文艺出版社本着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繁荣的精神,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极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潘树广

1997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界说	1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	4
第三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性问题	7
第二章 问题与方法	10
第一节 “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10
第二节 方法及其层次	16
第三节 传统方法与新方法	20
第三章 西学东渐与观念方法的更新	26
第一节 时代的追求——中外“会通”	26
第二节 进化论的影响与文学史观的更新	29
第三节 经验论和逻辑学的输入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33
第四节 西方美学的引进与文学研究主体意识的觉醒	38
第五节 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比较方法的兴起	41
第四章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与方法探讨	47
第一节 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思考	47
第二节 小说研究	55
第三节 戏曲研究	60

第四节 诗词研究	63
第五节 神话传说研究	74
第五章 “二十七年”古代文学研究留下的思考	81
第一节 “十七年”的曲折历程	81
第二节 反“左”的努力	84
第三节 “文革十年”中的厄运	93
第六章 “方法热”的前后	99
第一节 走出新经学的迷雾	99
第二节 “方法热”的兴起	104
第三节 “方法热”的反思	108
第七章 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方法	112
第一节 文献学方法的世界性及其研究路向	112
第二节 文学文本的采集	115
第三节 文学文本的鉴别	125
第四节 文学文本的解读	132
第五节 文学文本的整序	140
第六节 文献学方法与现代意识与其他	146
第八章 二重证据法与三重证据法	157
第一节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157
第二节 二重证据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161
第三节 三重证据法	166
第九章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鉴赏批评	172
第一节 鉴赏批评理论探源	173
第二节 鉴赏批评方法述略	180
第三节 鉴赏批评实践例说	183
第十章 社会历史学方法与古代文学研究	190
第一节 社会历史学方法的缘起与流变	190

第二节	传记研究法	196
第三节	经典的社会历史研究法	205
第四节	庸俗社会学方法	212
第五节	实用的文学社会学方法	215
第六节	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	220
第十一章	比较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227
第一节	比较文学透视	228
第二节	研究成果例说	241
第三节	若干问题的思考	254
第十二章	注重作家心理的理论模式	266
第一节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	267
第二节	精神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	269
第三节	精神分析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引起的反响	273
第四节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276
第五节	原型理论与文学批评	281
第六节	在古代文学中寻找原型的尝试	285
第十三章	注重作品本体的理论模式	291
第一节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	292
第二节	英美新批评	295
第三节	结构主义批评	302
第四节	结构主义叙事学	307
第五节	本体批评模式的启示	313
第十四章	注重读者接受的理论模式	319
第一节	西方阐释学的缘起与发展	320
第二节	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对阐释学的独特阐释	324
第三节	接受理论: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330

第四节	古代文学的阐释传统与接受新论·····	336
第十五章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史·····	343
第一节	研究史与学术史·····	344
第二节	古代文学研究史述略·····	347
第三节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概观·····	351
第十六章	结 语·····	355
第一节	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 指导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356
第二节	把握特点,兼通并用·····	362
第三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学风问题·····	366

第一章 绪 论

当我们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时候，首先面对的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根本性的提问：“中国古代文学”如何界定？怎样才算“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界说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时间断限与地域范围

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时间断限问题，有三种理解与处理方式：

1. 指上古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前言》说：“本书叙述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部分。”这是与“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对举的概念。

2. 指上古至鸦片战争（1840年）为止的文学。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持此说（见该书编写说明）。这是与“近代文学”对举的概念。

3. 指上古至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的文学。如近数十年出版的一些古代文学选本，多以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为下限，与通常所说的“古籍”的范围大体一致。

本书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上古至民国以前的文学。

就地域范围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包括辽阔的中国境内的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汉民族传世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最多,中国古代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的各民族文学的集合体。但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文学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何其芳在 1961 年曾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发掘和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编写出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面貌将为之一变。”^[1]

本世纪 50 年代,我国曾出现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热潮。1958 年 7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各有关省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至 1961 年初,已编出少数民族文学史 10 种(其中《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早在 1959 年已公开出版),文学概况 14 种,有关资料百余种。虽然,当时的编著不可避免地打上“大跃进”和“左”的时代烙印,但毕竟打破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沉寂局面,搜集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进入 80 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著出现了新的局面,相继出版了《苗族文学史》、《蒙古族文学简史》、《布依族文学史》、《壮族文学史》、《楚雄彝族文学简史》、《藏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满族文学史》等一批专史,以及整体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福乐智慧》、《萨迦格言》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果,孕育着对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全景式论述的有分量的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诞生。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广义和狭义

郭绍虞在 1947 年发表的《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一文中指

出：“一般文学史家对于文学所下的定义，原有广狭之殊。旧时倾向在广义的方面，于是以学术文为主体，经史子集都成为研究的中心；很有几种文学史可以代表这方面的。近来又倾向在狭义方面，于是以纯文学为主体，侧重在诗歌、小说、戏曲这方面，而中国文学史的前半部分，几乎只以诗歌为中心了。实则由文学史的研究言，固应以纯文学为中心，然而这只是现代人对于文学的见解，昔人固未必如此，——至少，未必完全如此。”这里所讨论的，实际上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以什么为主体的问题。

简单地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广义的文学或是狭义的文学，都欠妥当，应当作历史的分析。

魏晋以前，“文学”兼指“文章”与“博学”，涵盖文学作品与经史学术著作。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上或是创作实践中，均体现为文史哲水乳交融。文学因素除了以“纯文学”的形态出现外，还广泛渗入哲学、史学著述中，即所谓哲学的诗化与史学的形象化。因此，文学史家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多定位于广义。《庄子》、《左传》、《史记》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强化，文学逐渐取得独立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文笔之辩”异常活跃，初步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有艺术想象力、富于文采、以情动人者为文学，应用之文、学术论著并非文学。其二，出现了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录标准的文学总集——《文选》。其三，将作家群与学者群进行区分。如刘宋范曄撰《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前者收经学儒术方面的人物，后者收擅长文章诗赋的人物。又如宋文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馆，宋明帝立总明观，设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其四，出现了一批文学批评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总之，这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文学”的概念已距今不远。因此,文学史家研究魏晋以后文学,多以狭义的文学为主体。

狭义的文学或称纯文学,是“五四”以后流行的观念,指运用形象的手段反映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并习惯上按“四分法”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类。当我们讨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时,诗歌、小说、戏剧三者范围明确,可以与西方的文学分类方法相沟通;而散文则比较特殊,不能用西方的分类概念硬套。西方狭义的散文概念,指以抒情为主或抒情与叙事并重的文章。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中国古典散文,不但先秦两汉的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被排斥出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甚至连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章也算不上是散文,剩下的,恐怕只有晚明小品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实际。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宝库中,拥有西方散文所没有的东西——如骈文与辞赋,此其一;中国古代有许多哲理性或应用性文体很讲究文采,富于文学性(不仅魏晋以前如此,魏晋以后亦如此),此其二。以上两个方面,都应纳入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视野。3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以“纯文学”为标尺,把大批优秀的散文排斥在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妥当的。^[2]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

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翼。贬低理论研究的学术意义,或是无视实证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实证算不上是研究,都是褊狭之论,无益于古代文学研究。

一、实证研究

古代文学的实证研究,以探求古代作家文学活动的本然状态为主要目标。

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文学活动与文学现象。但历史已成过去,研究者所凭借的只是历史的遗留物——文字记载、实物资料和口述史料。文学史料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散佚、错乱,或被篡改,真伪杂陈。我们今天要认识古代文学的面貌,必须进行资料的搜集、梳理、鉴别和考证。举凡作品集的编纂、辑佚、辨伪、校勘和笺注,作家生平事迹与交游的考证,文学流派资料的辑校,文学事件资料的钩沉,均属实证研究范围。

古代文学深嵌于历史之中,这就要求古代文学研究者具备史学品格。实证研究以求真、求实为宗旨,追求事实的确认,这正是史学品格的体现。因而,实证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离开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便成了凿空之论。

二、理论研究

研究者对古代文学的事实材料进行思维加工,用一定的概念范畴、观点、原理做出理性的解释,是为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理论研究涉及诸多方面:或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或对文学思潮、风格、流派、文体的浮沉演变的原因作出理论概括,或对文学发展的规律阐述自己的见解等等。

理论研究是构建本学科的完整体系的必备条件。削弱理论研究,必然造成学科的畸形发展。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家章学诚曾批评当时的学风:“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此语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又有其自身特点。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者就是审美主体。审美意识因人而异,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总是与审美主体的强烈感情和主观评价相联系。因此,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

差异就在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感情是附带因素；在文学研究中，感情是重要因素。从事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需要有史学家的冷静，科学家的严谨，艺术家的激情。

三、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

实证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升华，同时又指导实证研究。就研究者而言，各人的学养、气质、兴趣不同，形成各自的学术风格和研究路向，或以实证研究为主，或以理论研究为主，大可各显神通，相得益彰；不必视若仇敌，水火不容。确有搞实证者，以为考证才是真学问，将一切理论文章均视为空洞无物，将一切新方法均斥为异端邪说。亦有搞理论者，以为理论研究才是研究，实证研究只不过是排比资料，繁琐考证。如此互相攻讦，实无助于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研究界多年来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古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令人不满。至于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有人归之于学风空疏，认为需要回归实证精神；有人归之于理论思维贫乏，认为需要强化理论建设。或强调实证研究，或强调理论研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事实上，水平不高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证研究未能高度结合。解决的办法，不是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而是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术研究，需要有包容四海的气度，更要有虚己从善的精神。20世纪20年代前后，王国维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论新学语之输入》）陈寅恪与吴宓论学，论及中国传统观念“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短处即实事实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吴宓《两僧日记》）作为国学名家而不故步自封，弘扬传统学术之长处而着意克服其弊端，这正是王、陈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超迈前人的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性问题

研究古代文学目的何在？有何作用？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圈内和圈外人士都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

研究古代文学，是为了对前人创造的丰硕的文学遗产的总结和借鉴。这种总结和借鉴，有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有助于陶冶性情、培养审美情趣，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某些经验材料和思想启迪。但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而不是立竿见影的，是渐进而不是速效的。把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定得过高，把它的作用强调得过大，非但不切实际，而且会违背研究工作的自身规律，甚至把研究引向旁门左道。

古代文学研究曾有过紧密为现实政治“服务”，试图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历史。60年代，为了配合“抓阶级斗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评价古典爱情作品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古代作家必须运用阶级观点》、《对古代英雄形象也要进行阶级分析》等一系列“逐步深化”的文章。70年代，为配合“评法批儒”，历代作家被重新排队，一概以“儒法斗争”划线。“法家诗人”吃香，“儒家诗人”遭殃。苏东坡也倒了霉，因为据说他在“儒法斗争”中立场不坚定。1974年初被批评为“油腔滑调”，同年年底升格为“两面派”（见《揭露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1975年又升格为“反动政客”（见《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苏轼》）。以上这段历史，记忆犹新，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进入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有人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改变几十年‘为政治服务’方向影响的研究重心，使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势相适应。建立并强化可以直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研究层面。”^[3]据说一个成功的例证，就是在《水浒》

故事的发生地开辟了“《水浒》旅游线”，接待了国内外旅游者数万人；又开发了“景阳岗陈酿”，仅1988年一年就上缴国家利税700万元；并以15万元资助《水浒传》、《金瓶梅》讨论会等学术活动。这当然是件好事，古典文学研究界正希望得到更多有眼光的企业家的资助。但《水浒》旅游线和景阳岗陈酿获得重大的经济效益，不是《水浒》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结果，而是经营策略的高明，属旅游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据称，在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开辟“金瓶梅文化旅游”的倡议，征求与会学者的意见，结果“除少数同志外，许多同志在根本上表示了异议”。倡议者批评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沙龙化”、“贵族化”倾向的表现，惋惜“《金瓶梅》研究界无疑是抛弃了一次发展的好时机”^[4]。笔者却以为，这正反映了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比五六十年代成熟得多。告别“趋时”的过去，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追求学术独立的精神，正是学术品格在新时期的提升。无论把古代文学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或是充当商品经济的奴婢，都是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应用研究和技术科学那样直接服务于社会。它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作用是间接的、持久的、潜在的，如果是直接的、速效的、轰动的，那倒是反常了。70年代中期“评法批儒”、评《红》评《水浒》，使得古典文学的“研究”一时间出现了“空前繁荣”，那是虚假的繁荣，病态的发展。由于那时的“研究”违背了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自身规律，其“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很快成了明日黄花。

在经济大潮中，许多青年不愿意选择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原本从事古代文学专业的也有不少改行了，这是正常的现象。社会需要各种研究人才，大量人才涌到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反倒造成全社会职业结构的失衡。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研究本民族古代文学的都只能是少数人。古代文学研究，永远是寂

寞的事业。梁启超说：“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5]只有自甘寂寞，专心致志，厚积薄发，才有可能研究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为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弘扬做出自己的贡献。传统文化不是一堆冷却了的灰烬，而是充满活力的智慧的火种。

-
- [1] 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见：《何其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66页。
- [2] 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只论述诗歌、词、戏曲、小说。又如柳村任的《中国文学史发凡》（1935），汉以前的文学只论《诗经》、《楚辞》，汉以来的文学只论汉赋和历代诗词、小说、戏曲。
- [3] 张学峰：《学术研究与经济开发——对古典文学研究困境的思考》，《文学遗产》1989年5期。
- [4] 同上。
-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章。

第二章 问题与方法

开展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善于提出问题,因为问题是科研的起点与动因,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研究中又要善于掌握方法,而方法是一个综合体系,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又有传统方法与新方法之别。

第一节 “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旨在阐述古代的文学现象并揭示这些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奥秘。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但它既是人类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分支,必然与其他研究活动有着某种共性,都要依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一系列的活动。考察其基本程序,遵循其基本原则,对研究工作应是有益的。

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活动,表现为定向的、有序的过程。研究工作,总是围绕着一一定的课题,展开一系列的探索活动。那么,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和动因是什么?

在世界科学史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英国的牛顿都曾探讨过科学研究的程序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归纳——演绎”的程序理论,牛顿则总结出“分析——综合”的程序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认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通过观察、实验所获得的